

儿童文学研究

ERTONG WENXUE YANJIU

第二辑



儿童文学研究

第二辑

叶圣陶 贺 宜等

装帧 马如瑾

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西路 1538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四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5.375 字数 141,000

1979 年 8 月第 1 版 197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40,000

统一书号: 10024·3650 定价: 0.41 元

儿童文学研究

第二辑目录

发扬艺术民主 尊重艺术规律……………贺 宜 (1)

学习周总理的讲话 繁荣儿童文学创作

——作家协会上海分会儿童文学组学习

周恩来同志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

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座谈纪要……………本刊记者 (10)

让少儿读物如梅花盛开

全国少年儿童读物出版工作座谈会发言选刊

一定要慎重其事地出好孩子们的书……………叶圣陶 (16)

儿童读物出版工作的新长征开始了……………谢冰心 (17)

不能辜负孩子们的期望……………张天翼 (19)

我对繁荣少儿科学文艺读物的几点想法……………高士其 (23)

为“小儿科”辩护……………金 近 (27)

组织好作者队伍 繁荣儿童文学创作……………韩作黎 (31)

少年儿童心理发展的特点……………吴凤岗 (37)

关于少年儿童读物的特点问题……………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54)

儿童诗专题座谈纪要……………董 玲 圣 野 整理 (67)

鸡毛何罪？

——重评贺宜的《鸡毛小点儿》……………朱 彦 (80)

沁人心脾的三月雪

——重评肖平的《三月雪》……………魏同贤 (86)

趣味·知识·教育

——读柯岩的童话剧《小熊拔牙》……………汪习麟 (93)

可爱的小傻

——评李大同的《小傻哥哥》

兼谈儿童文学创作的一两个问题……………刘厚明 (98)

优秀的儿童历史读物——《辛弃疾的故事》……………陈望衡 (102)

如此神奇的哑巴

——评《哑巴伙计》……………李楚城 (104)

叶圣陶和儿童文学……………张香还 (111)

百花苑中有一花

——谈儿童文学里的曲艺唱段儿……………李岳南 (127)

“拔高”与“压低”……………唐再兴 郑乃斌 (133)

说《小儿语》……………鲁 兵 (135)

作者谈创作

习作琐谈……………安伟邦 (139)

为了帮助孩子拨乱反正……………李大同 (149)

知识的广度、深度和构思……………刘兴诗 (156)

不灭的战绩

——记先驱者在儿童文学阵地上的战斗……………胡从经 (165)

简讯

少年儿童出版社评选优秀少年儿童读物…………… (138)

《少年文艺》《小朋友》《少年报》

一九七八年度好作品评奖揭晓…………… (9)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儿童科学画库》…………… (110)

给低幼儿童的好礼物…………… (169)

钟子芒遗作整理出版…………… (169)

《美术电影剧本选》即将出版…………… (155)

发扬艺术民主 尊重艺术规律

贺 宜

周总理一九六一年六月十九日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所作的讲话被封锁禁锢了将近十八年，今天终于冲破重重阴霾，得见天日，这既说明在文艺战线上斗争的尖锐性和复杂性，也说明了尽管来自“左”的和右的干扰破坏层出不穷，无产阶级的革命文艺路线必定能获得最终的胜利。周总理的讲话是继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来革命文艺思想新的发展和总结，它必将在我国文艺界引起巨大的反响，加快我国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繁荣兴旺。

学习了周总理的讲话，我深切感到发扬艺术民主和尊重文艺规律两条对于当前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创作，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对于儿童文学创作当然也是如此。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一条马列主义的基本原则。一个艺术作品好不好，一种文艺样式有没有存在的价值，首先要看社会效果，要由广大群众来批准来判断，要看它对广大群众起了积极作用还是消极作用，既不取决于领导个人的好恶，也不取决于个别“评论家”的肯定或否定，本来这应该是最普通的常识。可是，这些年来，这一条被遗忘或者被有意摒弃了。由于没有充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广大读者的意见和要求不受尊重，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未得认真贯彻，文艺创作的繁荣发展，遇到了不应有的障碍。五十年代后期，就有一些深受少年儿童欢迎的作品，受到一些莫名其妙的“左”得出奇的“评论家”们的挞伐。这些作品的罪名据说是宣扬了什么“人性论”、“资产阶级母爱”、“童心论”、追求

“儿童情趣”等等，有的人嗅觉特别灵敏，连用文艺手法介绍生物知识的动物故事，他也可以从中嗅出“人性论”的味道。还有一些探讨儿童文学创作规律的文章，也被说成是反对儿童文学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儿童文学特殊论”。对于真正的坏作品，例如内容反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或者有严重的政治错误或宣扬资产阶级思想的作品，当然应该批判。问题是对一些根本不是毒草，也并没有什么问题的作品，甚或对一些有较好社会效果的作品，仅凭一二个人的信口雌黄，或则捕风捉影，无中生有，或则断章取义，棍棒交加，帽子乱扣，轻则断送了一本书，重则影响了一个作者的政治和艺术生命。这实在是令人寒心的。如果多少讲点艺术民主，容许作者、译者、编者和读者为被批判的作品提出自己的申辩，或者容许开展讨论和辩论，听取各种不同的意见，把一些有争论的作品交给广大群众来分析解剖，是非曲直、是好书、是坏书，总是不难作出公正答案的。实在意见纷纭，相持不下，就不必仓卒做结论，可以存疑，留待以后适当时机再行研究，这样我们就可能不至于在一次草率的查书中，甚或由于一张大字报就否定了整整一批作品，更不至于演出根据一张大字报，竟然否定了所有中外历史题材、古典文学作品和童话、寓言、民间故事这些儿童文学样式的滑稽剧了。

上述这种现象的出现，说明缺乏艺术民主的恶果，而艺术民主的缺乏则正象人们所指出的那样，是政治民主不够在文艺工作上的必然反映。周总理在讲话中批评的缺乏民主作风，这并不是防患未然而提出的，而是针对当时实际存在的那种有害现象敲响的警钟。如果敬爱的周总理的这些语重心长的教导，当时能够得到正确的贯彻，我国的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必然早已出现一个万紫千红的春天，儿童文学的小百花园亦将繁花似锦，春意盎然。然而不幸的是，由于我们已知的和尚待揭露的种种原因，周总理的讲话遭到了封锁禁扼，而且随之而来的是此后出现了比讲话所指出的更为严重的缺乏艺术民主的问题，一直延续到文化大革命，发展为林彪、“四人帮”搞的那一套登峰造极的封建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整

个文艺面临着凛冽的寒冬，儿童文学小百花园中亦是百花凋零，一片肃杀。

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之后，文艺界得庆复苏，但是，长期被囚禁的人，一旦镣铐除去，在一个时期内步履仍然会颠簸难前。有些同志仍然余悸重重，顾虑不一，左顾右盼，一步三回头，思想不敢解放，力求保持最大的保险系数。当然，这是由于政治民主和艺术民主不够，尤其是经过林彪、“四人帮”的法西斯专政的长期统治所造成的后遗症，但是，现在在党号召我们要进一步解放思想，为把文艺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为四个现代化服务上面来而努力工作，那么，象上述的这种精神状态和行动迟缓、无所作为的现象，就完全不能适应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形势发展和斗争的需要了。

要使儿童文学在教育和培养全国两亿少年儿童成为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未来战士的宏伟事业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我们儿童文学作者必须作一番切切实实的艰苦努力，把多年来被弄乱了的有关儿童文学创作的理论方面的问题认真理一理，拨乱反正，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弄清楚一些理论是非和思想是非。我们必须坚决贯彻党的双百方针，首先是要真正实行百家争鸣，没有百家争鸣，不可能有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就是发扬艺术民主，而百花齐放则是发扬艺术民主的必然结果。对一个艺术作品或一种艺术观点，不能因为个人的好恶和主观断定而轻率简单地否定，更不能因否定了一个作品或一个论点，就进而否定一个人。周总理说：“艺术是要人民批准的。”但是有的人并不尊重人民的意见、群众的意见。那种粗暴蛮横的态度只能是林彪、“四人帮”的态度，我们党是坚决反对的。我们一定要尊重广大群众的意见，要正确开展文艺批评。既容许批评，也容许反批评，也容许作者或编、译者的答辩，提倡争鸣，要群言堂，不要一言堂，要“三不主义”，不要“五子登科”。现在，在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教育正在逐步深入人心。毛主席所说的既有集中又有民主，既有纪律、又有自由，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的

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那样一种政治局面正在形成。这为开展百家争鸣创造了极好的条件。从繁荣社会主义创作的要求出发，开展善意的、实事求是的批评和讨论，对过去的有关儿童文学方面被批判和否定的作品和理论，有必要根据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马列主义原则重新加以检验，开展争鸣，进行讨论，分清是非，这在当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有利于澄清一些在极“左”思潮影响下被弄糊涂了的思想，调动广大作者的创作积极性，推动儿童文学创作和理论研究工作的进一步发展。特别对于那种在广大作者思想上造成了混乱，至今仍然流毒甚深，后果严重的问题，必须首先分别正本清源，拨乱反正，以肃清它的不良影响，这尤其是当务之急。

有哪些需要认真进行讨论和澄清的问题呢？我想下列几个问题是应该讨论的。

一、儿童文学究竟为谁服务的？以前有人提到儿童文学为儿童服务，受到了严厉的批判，说是反对毛泽东文艺思想，因为毛主席说过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我认为，儿童文学为儿童服务跟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根本不应该对立起来，文艺为工农兵是一个总的方向。儿童文学为少年儿童服务，则是从我国两亿少年儿童读者对象提出的，面对如此众多的广大小读者，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来教育他们，同时又要最大限度地满足他们的艺术享受，难道这还不是为儿童服务吗？儿童文学不为少年儿童服务，就根本无从体现它为工农兵服务的神圣职责。在我们的社会制度下，一切工作在总的意义上说，没有一种不是为工农兵和人民大众的利益服务的。由于特定的工作性质和对象的不同，都可以有它们自己的服务对象。这本来是十分正常和合理的，根本不存在否定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问题。仅仅说儿童文学为工农兵服务，而不明确儿童文学的具体服务对象，往往使儿童文学丧失了它应有的特征。事实上正是由于儿童文学没有明确解决为谁服务的问题，这些年来出现了一些不应有的混乱现象：有的人把儿童文学“为工农兵服务”，理解为只许儿童文学描写和反映工农兵生活而不能反映少年

儿童的生活。谁提出多反映一点儿童生活，谁就被指摘为“儿童文学特殊论”或“儿童本位论”。有的人把儿童文学为工农兵服务，理解为作品只须成年人认可，而不必得到少年儿童群众自己的批准。他们根本不考虑少年儿童本身的思想感情、兴趣爱好和不同的年龄特点，不注意是否能为少年儿童所理解，所喜闻乐见。只凭着主观想象和愿望，想当然地把一些东西塞给孩子们。结果就出现了大量缺乏儿童文学特点的不受小读者欢迎的“儿童文学”作品，它的唯一的“特色”就是比成年人看的作品短小一点，粗糙一点，简陋一点。这种作品遭到广大少年儿童读者的冷淡和厌弃，是理所当然的。因此，从实践的角度来考虑，明确儿童文学为儿童服务这一具体任务，跟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丝毫没有抵触，它有利于发挥儿童文学特点，更好地对小读者进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教育，有利于使儿童文学更好地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相反，把“儿童文学为儿童服务”跟“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对立起来的那种做法，完全是形而上学的，主观唯心主义的。实践证明，对于儿童文学的繁荣发展是十分不利的。现在已经到了认真澄清，辨明是非的时候了。

二、儿童文学如何为少年儿童服务？这个问题，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以及后来被林彪、“四人帮”的破坏捣乱下，被搞得乱七八糟。这首先牵涉到对儿童文学的教育作用和娱乐作用的想法问题。儿童文学当然应该是对小读者进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教育的一种工具。同时，作为一种艺术，它也应该给小读者美感和愉快的享受。事实证明，少年儿童对儿童文学的爱好，首先出于艺术欣赏和满足精神享受的要求。而后在阅读欣赏中自然而然地接受作品中的思想的教育，感情的陶冶，这样的书或作品，看得多了，自然就影响小读者的思想、感情、品质性格。这个作用用一句成语来概括，就叫“潜移默化”。潜移默化就是需要通过对作品的欣赏，日积月累，多方面地影响和作用于少年儿童，而不能期望仅仅通过一个或几个作品达到根本性的影响和形成他们的革命世界观。在广大少年儿童中引起极大反响并且强烈地影响他们思想的作品是有的。但是

在全部作品中，这类作品总是少数，大量作品是用多方面的生活内容和题材来吸引小读者。这种作品分散地、个别地来看，既没有大义宏旨，也不能“立竿见影”立见神效，但从长远来看，从整体来看，它们在培养广大少年儿童对生活的热爱，培养他们多方面的健康的兴趣爱好，培养他们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和正直、善良的性格等方面，却有陶情铸性、潜移默化的作用。儿童文学一定要写得有趣生动，要为广大少年儿童喜闻乐见，乐于接受，这是广大少年儿童读者的共同要求，也是儿童文学的艺术规律所决定的。也就是大家说的“寓教育于娱乐之中”。

少年儿童好动，他们不发生兴趣的东西，决不能持久地吸引他们。儿童文学必须生动有趣。生动有趣就有娱乐性，这是儿童文学的一条艺术规律。可是那些道貌岸然的极“左”评论家和林彪、“四人帮”，把趣味一概斥之为资产阶级思想的表现，似乎只有资产阶级才要有趣，无产阶级只需要索然无味、味同嚼蜡的东西。周总理在讲话中说：“群众看戏、看电影，是要从中得到娱乐和休息，你通过典型化的表现形象，教育寓于其中，寓于娱乐之中。”这几句话岂止是指出了电影戏剧如何完成其教育任务的特点，也指出了其它文艺创作完成其教育任务的特殊方法——这个方法就是“动之以情，喻之以理”，“怡情悦性，潜移默化”。如果说，成年人尚且要拒绝那种枯燥乏味的标语口号式作品，那么对于那些天真活泼、爱动好玩的孩子们，怎么能要求他们正襟危坐地读那些索然无味的东西而甘之如饴呢？如果说，当一个文艺作品根本不能吸引孩子们的注意力的时候，又怎么能够要求这个作品对读者发挥它的教育作用呢？

“寓教育于娱乐之中”，这不是一句普通的口号，而是一切文艺创作的基本规律之一。不承认这条规律，就象不承认文艺创作必须通过形象思维反映生活一样，只能使文艺成为群众拒绝接受的垃圾。这些年来我们不敢谈儿童文学的趣味性、娱乐性，（包括儿童情趣），谁一谈，就犯下了宣扬资产阶级文艺思想的罪孽。其实，古往今来，哪一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不是具有相当的娱乐性——

即趣味的？正是由于这种娱乐性，才能吸引多少代的千千万万小读者，从而使他们从作品中接受教育，汲取养料。我们要使我们的作品为广大少年儿童所喜闻乐见，要使它们充分发挥它们的战斗教育作用，就必须努力做到这一条。

儿童文学的教育作用和娱乐作用是辩证的统一，相辅相成，而不是相互排斥。只要娱乐作用，为趣味而趣味，不问其思想内容和社会效果究竟如何的儿童文学有没有？那也是有的。那是真正的为资产阶级所提倡的儿童文学。但是，我们所要求的是教育作用与娱乐作用相统一的儿童文学，是要求能够有利于培养儿童社会主义思想品质而又为广大少年儿童读者所乐于接受的儿童文学。那种把娱乐性一概斥之为资产阶级文艺思想，把它跟儿童文学的教育作用对立起来的看法，似乎很重视儿童文学的教育作用和政治性，实际上是要使儿童文学为广大小读者所厌恶所摒弃，所以它恰恰是削弱和取消了儿童文学的教育作用。这跟那种只要趣味性、娱乐性，而不要教育性和政治性的资产阶级儿童文学，实质上对社会主义儿童文学的繁荣发展同样十分有害。因此，我们今天应当正确认识儿童文学的教育作用和娱乐作用两者的关系，对儿童文学的娱乐性、趣味性作出实事求是的正确估价。

提到儿童文学如何为儿童服务，无可回避地还得联系一个所谓“童心论”的批判问题。“童心论”这个论，在历来的儿童文学理论研究中从未见过，只是在六〇年代初忽然被“发现”的。当年陈伯吹同志在谈到如何判断一个儿童文学作品好坏时，说过他的看法。他说：“审读儿童文学作品而不站在‘儿童立场’上，不用‘儿童观点’去透视，不在‘儿童情趣’上体会，不怀着一颗‘童心’去赏鉴，那必然会失之毫厘，谬以千里的吧。”（《儿童文学简论》185页）这里出现的“童心”，就是而后成为被批判的“童心论”的来源。

伯吹同志的这个见解，仅仅从儿童的角度来谈如何审读儿童文学作品，照实说，我认为确实是不妥当的。因为，对待任何文艺作品的估价，如果离开作品的思想性而只着眼于艺术性，那就有陷入“艺术至上论”的危险。对儿童文学创作也是一样。只谈“儿童

立场”、“儿童观点”、“儿童情趣”、“童心”等等，而不把作品的思想性、教育意义作为估价具体作品的前提，也有陷入“艺术至上论”或“儿童本位论”泥坑的危险。至少，这样来谈儿童文学作品的好坏问题，是片面的。

对于这样的问题，如果开展正常的同志式的、善意的文艺批评和讨论，各抒己见，百家争鸣，最后取得比较一致的实事求是的正确意见，是完全可能的，对于进一步弄清楚儿童文学创作的一些基本理论，自然大有好处。可是，当时在一股极左思潮的冲击下，不仅在有关报刊上进行了批判，而且还组织了不同规模（包括一些根本不了解儿童文学的学生在内）的社会批判会，如此大张旗鼓，如临大敌，在儿童文学界造成了不必要的紧张空气，既不利于团结，也不利于从思想上、理论上说服（不是压服）别人，使同志心悦诚服地接受批评。这种简单粗暴的批评，在当时已经“左”得可以了，可是，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在林彪、“四人帮”的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统治下，极左思潮就更加猖狂了，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对“童心论”的批判就无限扩大，无限上纲，横扫千军，否定一切，谁说过搞儿童文学创作要考虑对象，写作时要“心中有儿童”，要有的放矢，这也是“童心论”；谁说过儿童文学作品要力求符合儿童的思想，要符合儿童心理和阅读心理，这也是“童心论”；谁主张儿童文学要多反映一点儿童生活和儿童的精神世界，这也是“童心论”；谁说过儿童文学要有点“儿童情趣”，这也是“童心论”；谁说儿童文学要有儿童特点，这又是“童心论”；……什么都是“童心论”，而且都是“反动透顶”、“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童心论”。于是，一切主张儿童文学要有它自己的特点和规律的，都成了宣扬“资产阶级童心论”的罪人。结果，儿童文学创作出现了一个长期来主题单一、题材狭窄、干巴枯燥、死气沉沉的局面，小读者们嗷嗷待哺，但是又无法下咽。回忆当时的情景，至今仍然深感愤慨和痛心。现在把“童心论”的问题重新来好好认识一下是时候了。这是打开多年来形成的禁区，帮助儿童文学作者解放思想的一个重要突破口。

对以上这些问题，根据实践来检验一番，充分发扬艺术民主，

开展争鸣,经过充分的讨论,取得正确的认识,那就为进一步解决儿童文学其它许多重要问题,例如主题、题材问题,写什么、怎样写的问题,儿童文学的艺术规律问题,对一些受过批判的作品作出正确评价问题等等,创造更为有利的条件。周总理的讲话给马列主义文艺思想宝库增添了一个具有巨大威力的理论武器,它将毫无例外地给所有文艺工作者增强战斗力。在把文艺工作的重点转向为四个现代化服务的这一历史任务中,我们儿童文学工作者也将更加有能力有信心地完成自己的战斗任务。

《少年文艺》《小朋友》《少年报》 一九七八年度好作品评奖揭晓

为了贯彻全国少年儿童读物出版工作座谈会精神,繁荣儿童文学创作,《少年文艺》、《小朋友》和上海《少年报》先后对一九七八年刊登的作品进行评奖活动。对评出的好作品发予奖状、奖品、奖金作为鼓励。《少年文艺》还召开大会举行隆重的发奖仪式。

《少年文艺》的得奖者是:

小说:任大星、程玮、程远。特写:李仁晓、刘铁、宋方。童话:金近、严文井。剧本:蔡峰。诗:高士其、万里鹏、季振邦、章寿明。“小辣椒”:蒋华健。少年习作:朱玲妹、陆林芳。插图:韩敏、韩和平、朱延龄。封面:宋贤珍、汪诚一。

《小朋友》的得奖者为:

文艺创作:任溶溶、鲁兵、金逸铭、张继楼、樊家信、李约拿、张立俊、薛家柱、望安、程逸汝、王琮祺、叶永烈、丁逸民、陶春生、水永根、黄衣青、郭宾。

美术作品:速泰熙、沈培、施福国、徐启雄、温泉源、陈力萍、万籁鸣、张乐平、徐茂林、田原、彭国良、阿达、乐小英、姜长庚。

《少年报》一九七七、一九七八年度的“小百花奖”获得者为:

小说:陈传敏、李仁晓、程玮、任大霖、朱家栋。童话:贺宜、洪汛涛、包蕾。诗:袁文燕、任溶溶、刘饶民、芦芒、黄修纪。

阿 方 丁 二

学习周总理的讲话

繁荣儿童文学创作

——作家协会上海分会儿童文学组学习
周恩来同志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
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座谈纪要

一九七九年二月十二日，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儿童文学组，学习讨论周总理一九六一年六月十九日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有五十多人参加，贺宜同志主持了这次学习讨论。陈伯吹、包蕾、任溶溶、鲁兵、任大星、任大霖、李楚城、洪汛涛、孙毅、黄衣青、圣野、修孟千、陆品山、水飞、江英等同志发了言。

同志们心情无比激动，畅谈了自己的学习体会，认为周总理的讲话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是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发展。周总理总结了建国十二年来文艺工作的经验教训，系统地阐

明了社会主义艺术民主的问题，这个讲话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重要文献。在当前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来的重要时刻，学习周总理的重要讲话，对于解放思想，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促进儿童文学事业的繁荣兴旺，使儿童文学能更好地为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总任务服务，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陈伯吹、孙毅、黄衣青等同志说：周总理的讲话虽然是在一九六一年讲的，已经过去十八年了，但今天读来仍然感到很亲切，总理的讲话，对我们当前的创作、出版、研究、教学，都有密切的关系。

鲁兵等同志对当年上海市委主要负责人禁锢总理的讲话表示十分愤慨，他们说，这才真的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他们指出，那个人提出所谓“大写十三年”，正是为了抵制周总理的讲话。同志们指出，二十年来，在一股“左”的思潮的控制

下，儿童文学创作受到严重的摧残。儿童文学工作者受到“五子登科”（套框子、抓辫子、挖根子、戴帽子、打棍子）的严重迫害。总理的讲话，正是我们在儿童文学领域拨乱反正和正本清源的有力武器。

极左路线对儿童文学的干扰和破坏

同志们回顾了建国以来儿童文学的状况。一九五五年毛主席对加强儿童读物的创作、出版和发行工作作了批示。一九五六年毛主席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繁荣文艺和发展科学的方针。因而在一九五六年和一九五七年，儿童文学出现了繁荣的局面，发表、出版了不少好作品，在此同时，初步形成了一支儿童文学的创作队伍。同志们都称誉说，这是儿童文学的黄金时代。可惜好景不长，到了一九五八年“双反”运动，出现了横扫之势，一张大字报，可以否定一大批作品。当时批判“古人动物满天飞”，结果是古代故事、民间故事绝了迹，鸟言兽语的童话也

不复可见。更有甚者，将童话所写的幻想简单地和现实生活等同起来，童话写到老鼠，就是反对除四害，就是反对党的政治运动。几个人这么一说，无形中就成了禁令，于是不但创作童话“清除”了老鼠，连翻译作品中的洋老鼠也一概“消灭”掉了。

同志们指出，多年来只反右，不反“左”，连绵不断，愈演愈烈。对于文艺，只讲政治性，不讲文艺本身的规律，本身的特点。陈伯吹同志曾经讲过：“儿童文学以正面教育为主，寓教育于娱乐之中，起潜移默化的作用。”包蕾同志也讲“儿童文学的作用是潜移默化”，都被指责为“童心论”，儿童文学失

去自己的特点，也就不成为儿童文学。果然如此，一九五八年搞所谓“开门办社”“快速出书”，请一些完全不了解儿童，更不了解儿童教育，而又从来没有写作过的人写书，甚或依靠剪刀浆糊，一天出一本书，其结果是小读者们都不要看，糟蹋了造纸工人、印刷工人的劳动。这些书只好回炉当纸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不管什么作品样样都要配合运动，样样都要“突出”政治。

陆品山等同志说：当时有个杂志为了配合中心任务，一期竟不得已列了六个中心，弄得编辑无所适从，结果是什么中心也没有。对于这种做法，当时就有不少同志反对，提出儿童文学应该以反映儿童生活为自己的主要任务，结果被作为宣扬修正主义文艺路线来批，材料居然装入档案袋。在

“四人帮”控制文艺的时期，这种极左的路线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儿童文学也就气息奄奄了。

李楚城同志说：“多年来，儿童文学有繁荣的阶段，却被说成是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文艺路线！反来反去，文艺几乎被消灭，特别是儿童文学，至今尚没有一部反映儿童生活的长篇或中篇。是没有写作的人？还是没有写作的土壤？这都是由于一条极左路线破坏的结果。”

鲁兵同志说：“二十年来，搞一次批判，儿童文学就落一次膘，到文化大革命时已是奄奄一息了。我在庐山说过这话，据说有的同志不以为然，这可以讨论。不过，这不是什么理论问题，而是现实问题，一切尊重现实的人，都会看到这一事实。”

没有政治民主，哪有艺术民主？

同志们一致认为，发扬艺术民主，一定要有政治民主作保障，而民主的实质是允许人讲真话。没有民主就没有文艺

的繁荣，也没有国家的兴旺。很多同志联系自己二十多年来所遭受的打击和迫害，无不感慨万分。有的同志曾受到处分

甚至被开除党籍；有的在报刊上受到批判；有的同志被划为右派；有的被关进牛棚多年……这些同志之所以受到迫害，就是因为他们讲了真话，在理论问题上直率地发表自己的观点，在创作中真实地反映了生活。

鲁兵同志讲：开展文艺批评，按理说应该是正常现象，批评，或者批判，都是鉴别的意思。但是多年来大家一听到批判就心惊肉跳。这是因为“批判”在实际上已成了打棍子的代名词。讲的是：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做的却是：言者有罪，闻者暴怒。没有政治民主，也就无艺术民主可言。有些批判家其实是拆字先生，索隐专家，专在人家的作品中发现“恶毒攻击”，“反党祸心”……谁还敢再写童话、寓言，“太阳”、“皇帝”，更是需要避讳的。

孙毅同志改编的《猪八戒学本领》木偶剧，唱词中有“一二三四五，金木水火土，老猪读天书，越读越糊涂”，被硬说成是恶毒攻击学习毛主席著作而遭到批判。

包蕾同志说：“张春桥在大

会上点了我改编的美术片《金色的海螺》，要大家看看有什么问题。这个‘大家’是中了他和姚文元之毒甚深的‘大家’，‘大家’一看，问题自然不得了，什么‘人性论’、‘阶级斗争熄灭论’、‘爱情至上论’等等大帽子都来了，美术片自然成了‘大毒草’，我也成了‘反党分子’、‘反动学术权威’，被关进牛棚达三年之久。那时有什么好说的呢，连叹气都要受到批判，说成是对社会主义有不满情绪。关汉卿在《窦娥冤》里有句唱词：‘难道天公应钳恨口，不许长吁二三声’，林彪、‘四人帮’比古代封建皇帝统治者还厉害，打了你还要你说‘打得好，该打。’”

陈伯吹同志说：“多年来对我提出的一些论点曾经反复批判，被指为‘童心论’。我一直认为儿童文学应该以正面教育为主，寓教育于文化娱乐之中，起潜移默化作用。如果耳提面命，直接灌输几条干巴巴的教训，这样还要儿童文学干什么！儿童文学就是要以艺术形象通过艺术手法，产生感染力量去教育读者，使受教育者终身难忘。我认为文艺工作者应有自